

全球智库半月谈

美国应与中国协商新型经济关系

韩国成为特朗普贸易战略新的前沿阵地

中国 BIT 进程及对中加 FTA 谈判的启示

中国钢铁过剩产能的估计

中国经济增长的测量偏误

本期编译

安婧宜

郭子睿

侯书漪

黄杨荔

史明睿

申劭婧

许平祥

伊林甸甸

杨 茜

张舜栋

(按姓氏拼音排序)

中国社会科学院陆家嘴研究基地 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

世界经济预测与政策模拟实验室 国际战略研究组

《全球智库半月谈》是中国社会科学院副院长李扬主编的中国社科智讯数据分析报告的组成内容，由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经济预测与政策模拟实验室和国际战略研究组为您提供。

世界经济预测与政策模拟实验室

主任	张宇燕		副主任	何帆
首席专家	张斌	开放宏观		
团队成员	刘仕国	欧洲经济	徐奇渊	中国经济
	吴海英	对外贸易	曹永福	美国经济
	冯维江	新兴市场	肖立晟	国际金融
	高凌云	对外贸易	熊爱宗	国际金融
	梁永邦	宏观经济	杨盼盼	国际金融
	常殊昱	国际金融	史明睿	科研助理

国际战略研究组

组长	张宇燕		副组长	何帆
召集人	徐进		协调人	彭成义
团队成员	李东燕	全球治理	袁正清	国际组织
	邵峰	国际战略	徐进	国际安全
	薛力	能源安全	欧阳向英	俄罗斯政治
	黄薇	全球治理	冯维江	国际政治经济学
	王鸣鸣	外交决策	高华	北约组织
	卢国学	亚太政治	王雷	东亚安全
	彭成义	中外关系	徐秀军	全球治理
	田慧芳	气候变化	李燕	俄罗斯政治

任琳	全球治理	丁工	发展中国家政治
赵洋	科研助理	刘畅	科研助理
周乐	科研助理		

联系人: 史明睿 邮箱: iwepceem@163.com 电话: (86)10-8519 5775 传真: (86)10-6512 6105

通讯地址: 北京 建国门内大街 5 号 1543 邮政编码: 100732

联系人: 许怡 邮箱: naonao0619@163.com 电话: (86)21-50815287 传真: (86) 21-50815265

通讯地址: 上海浦东新区世纪大道 1600 号 24 楼 2409 邮政编码: 200122

免责声明:

版权为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经济预测与政策模拟实验室和国际战略研究组所有, 未经版权所有人许可, 任何机构或个人不得以任何形式翻版、复制、上网和刊登, 如有违反, 版权所有人保留法律追责权利。《全球智库半月谈》所编译的文章, 仅反映原文作者的观点, 不代表编者、版权所有人或所属机构的观点。

目 录

世界热点

特朗普是否会以国家安全为名发动贸易战？ 6

导读：近期特朗普政府宣布，美国商务部将对部分商品的进口进行国家安全审查，以评估这些进口行为是否威胁了美国的国家安全，这一表态受到了各界的高度关注。对此，PIIE 研究员针对这项政策的来龙去脉和潜在后果进行了分析。

美国应与中国协商新型经济关系 8

导读：近年来，中美之间的贸易摩擦时有发生。自特朗普上台以来，外界不断猜测中美之间是否会爆发贸易战。作者认为，推动中美双边经济关系走向健康发展的轨道，符合两国的共同利益。作者呼吁美国政府采取包括多边谈判和双边谈判在内的多种手段，尽快与中国达成正式的双边贸易协定。

韩国成为特朗普贸易战略新的前沿阵地 11

导读：自上任并打击了美国与中国、墨西哥和欧洲的贸易关系后，特朗普总统已经将其重心转移到重新谈判 2012 年生效的韩美贸易协定（KORUS）上。6 月 30 日与韩国总统文在寅（Moon Jae-in）会面时，特朗普说这样的会谈应“立即”开始。

印度及其他金砖国家的制造业：表现不佳 14

导读：许多分析员认为，印度的制造业一直不如别的国家发展的好。它在印度 GDP 中所占比例较小且保持稳定。为此，印度政府一直努力试图改变这一状况。本文将印度的制造业放在全球经济的背景下进行考察，并根据相关分析提出了可能提振其发展的一些可能方法。

聚焦中国

中国 BIT 进程及对中加 FTA 谈判的启示 17

导读：中国双边投资协议谈判和单边自由化的进程已经取得非常大的进展，这将为中加自由贸易协定谈判提供一个稳定的区域和世界贸易环境。

香港：两阶段的经济实验 21

导读：战后的香港生活水平显著提高，这一转变被米尔顿·弗里德曼视为自由经济对经济增长潜在影响的实验。本文评估了郭伯伟爵士自由放任政策的贡献。这一政策奠定了香港的成功，受到弗里德曼的推崇。此外，本文还探讨了香港回归中国的二十年来，香港经济的第二阶段实验是否应该继续进行。

中国钢铁过剩产能的估计 23

导读：传统测量钢铁过剩的方法来源于世界钢铁协会，忽视了季节性因素和某些特殊的时期，钢铁厂更新设备需要保持一定数量的“闲置产能”。2015 年底，中国实际的钢铁过剩产能是 1.28 亿吨，远远小于经常被引用的 3.28 亿吨。在评估中国钢行业过剩产能时，需要注意一部分产能的削减是发生在铁行业，而且同时会有新增产能。

中国经济增长的测量偏误 25

导读：2015 年以来，很多华尔街分析师认为中国官方公布的 GDP 数据高估了当前中国经济增速，从而建立模型自行计算中国经济增速。本文为摆脱传统预测中的测量偏误，选择建立夜间灯光强度的指标与经济增长的相关关系，从而评估官方数据是否出现高估。

经济政策

央行前瞻性指引的悖论 29

导读：经济学术语中用“前瞻性指引”一词来形容中央银行关于未来政策利率可能的路径。标准的货币模型意味着前瞻性指导对当前的结果有巨大的影响，而最近的文献一直试图找到这种论断与现实的一致性。

战略观察

印度应积极投身于时代的动荡 31

导读：面对中国日益成为国际准则的制定者，印度愈发感到不适。然而，这对印度而言几乎不可避免，因而需积极做好准备加以应对。

本期智库介绍 33

特朗普是否会以国家安全为名发动贸易战？

Chad P. Bown 等 / 文 伊林甸甸 / 编译

导读：近期特朗普政府宣布，美国商务部将对部分商品的进口进行国家安全审查，以评估这些进口行为是否威胁了美国的国家安全，这一表态受到了各界的高度关注。对此，PIIE 研究员针对这项政策的来龙去脉和潜在后果进行了分析。全文如下：

在特朗普政府对贸易问题的强硬表态中，有一项不太寻常：从国家安全角度对某些进口商品频繁提出的指控。2017 年 4 月，特朗普政府要求商务部加快对钢铁制品和铝制品进口的调查，理由是“这两种商品是美国制造业和国防业的基础性支柱产品”。据称，商务部针对钢铁进口的调查报告将于近期出炉。

本文将讨论特朗普政府的这些举措可能带来的一系列后果。初步结论是，这些措施将削弱以规则为基础的国际贸易体系，至于从国家安全角度提出限制进口的理由是否合理，尚未得出明确结论。可以肯定的是，这些举措很可能进一步对美国的经济造成伤害，并且招致美国贸易伙伴的报复。更令人担忧的是，其他国家可能竞相效仿特朗普政府的做法，在维护国家安全的大旗下倒行逆施地推动贸易保护主义。除了中国，特朗普政府的贸易指控还可能伤害到加拿大、墨西哥、德国、韩国、日本等美国的传统盟友。

美国对贸易伙伴国发起贸易调查的传统悠久。一般而言，这种调查不是针对潜在的倾销行为，就是为了调查某种商品是否存在不公平的政府补贴。截止 2017 年 6 月，美国商务部共有超过 400 条正在实行的进口限制政策，其中超过半数是针对钢铁制品进口的。然而，特朗普政府并没有发起传统的反倾销或反补贴贸易调查。最近几个月，特朗普政府另辟蹊径，援引 1962 年通过的《贸易发展法案》第 232 条(b)款，指示商务部调查若干进口商品是否“威胁到了美国的国家安全”。

Bown 在近期发表的论文中指出，《贸易发展法案》第 232 条是整个法案最少被使用的条款之一。1980 年以来，仅有 14 起调查是以国家安全的名义被发起的（见下表），上一次此类调查发生在 2001 年，目标是钢铁制品。在所有 14 起发生过的国家安全指控中，只有 2 起最终成功达成了贸易限制政策，分别发生在 1982、1986 年。此外，尼克松政府的贸易律师也曾经成功过援引该条款，为其 10% 的附加关税提供法律依据。

表 1 美国政府对贸易法案的运用情况：1980-2016

United States' use of trade laws, 1980-2016				
Number of:	Antidumping (Section 731)	Countervailing duties (Section 701)	Global safeguards* (Section 201)	National security* (Section 232)
Investigations	1,379	631	31	14
Self-initiated (i.e. by the US government)	6	6	4	3
Trade restrictions imposed	649	279	11	2
As import tariff or quota	626	236	8	1
As suspension agreements, voluntary export restraints, mixed	23	43	3	1

* The last investigations under Sections 201 and 232 were initiated in 2001.

Source: Bown 2017, table 1a.

从历史经验来看，大多数贸易诉讼案件都由美国国内的企业、工会或贸易团体发起，但这次情况不同，是特朗普政府主动发起的“自诉案件”，目的是为了“采取切实措施，防止美国企业受到国外商品倾销的伤害，更好地保护美国企业主的利益。”

一旦商务部的调查报告得出结论，认为目前的进口商品确实危害了美国的国家安全，总统就有权绕开国会直接发布行政命令，要求施加惩罚性关税或进口配额。由于第 232 条款并没有对这种关税或配额提出具体限制，因此理论上总统可以将关税的税率提高到任何水平。

如果特朗普政府发起的国家安全调查确实通过，将对依赖国外原材料进口的美国企业造成打击，原本使用进口廉价原材料的美国制造业企业将失去原有竞争力。作为钢材消耗大户，美国几大汽车业巨头都已多次表达了他们的担忧。

外界一般认为中国是本次贸易调查的主要对象国之一，因为中国是全球最大的钢材出口国。然而，商务部已经对来自中国的钢材进口施加过足够多的限制性条款，因此本次的贸易限制政策预计会更多地影响来自加拿大、墨西哥、德国、韩国和日本的钢材进口，从而影响全球钢材贸易市场的分配情况。

可以预见，美国的贸易伙伴国对此绝不会坐视不管，他们可能在 WTO 对美国发起反贸易保护诉讼。不过好消息是，“国家安全”是一项相当有说服力的理由，迄今为止，以国家安全为由出台的贸易保护政策还鲜有在 WTO 遭到巨大阻力的案例。因此，与等待 WTO 漫长的裁决相比，美国的贸易伙伴国也可能转而寻求对来自美国的钢材进口施加报复性关税。正如欧盟贸易专员 Cecilia Malmström 所说：“我们一直是美国的伙伴和盟友。如果美国真的施行新的保护主义措施，我们当然会寻求 WTO 的裁决。而一旦这种举措伤及了欧盟的利益，我们也一定会进行反击。”此外，还有一种潜在的危险是，其他国家效仿美国的做法也在国内施行保护主义政策，这无疑将对国际贸易体系造成重大伤害。

本文原题为“Will Trump invoke national security to start a trade war?”。本文作者 Chad P. Bown 是彼得森国际经济研究所 (PIIE) 高级研究员。原文于 2017 年 7 月发表在 PIIE 官网。
[单击此处可以访问原文链接。](#)

美国应与中国协商新型经济关系

Simon Lester 和 Huan Zhu / 文 张舜栋 / 编译

导读：近年来，中美之间的贸易摩擦时有发生。自特朗普上台以来，外界不断猜测中美之间是否会爆发贸易战。作者认为，推动中美双边经济关系走向健康发展的轨道，符合两国的共同利益。作者呼吁美国政府采取包括多边谈判和双边谈判在内的多种手段，尽快与中国达成正式的双边贸易协定。全文如下：

在历经了长达 15 年的申请期后，中国终于在 2001 年成功加入了世贸组织（WTO）。尽管经济增速惊人，但当年中国还仅仅是一个发展中国家，人均 GDP 为 3227 美元，且仅仅占全球贸易总额的 4%。

而如今，中国的人均 GDP 已经接近了 15000 美元，同时占全球贸易总额的 11.9%。尽管外界对中国的经济成就赞赏有加，但许多国家也时常批评中国经济由市场主导成分不够大的事实。一些人认为，中国这种扭曲市场的经济制度使其在国际贸易市场上获得了不公平的竞争优势。多年来，美国政府一直在采取包括关税和进口配额在内的各种措施来试图抵消中国的这种优势，但美国的企业显然对此还不够满意。可以说，美国政府多年来试图促进中国经济更加市场化的努力并没有取得喜人的成功，而联邦政府习惯于采取的各种单边制裁措施并不能有效地制衡中国这样一个庞大的贸易伙伴。更令人担忧的是，特朗普政府的多位要员曾经在各种场合上对中国提出过非常尖锐的批评，这使得中美之间爆发贸易战的危险大大上升。

与其和中国开打两败俱伤的贸易战，特朗普政府还有更好的选项可供选择，那就是更加积极地与中国展开磋商，推进中国的经济市场化进程。为了达成这个目的，美国在 WTO 框架之外开展努力，推动与中国建立新型双边经济关系。美国政府可以首先考虑发起与中国的正式双边贸易谈判。如果特朗普政府希望向中国传达明确的信息，那么类似的谈判无疑是最为划算的方法。

尽管难度不小，但通过双边贸易谈判来推动中国经济的市场化进程并不是史无前例的，当年中国试图加入 WTO 的漫长谈判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为了加入 WTO，中国在国内进行了一系列市场化改革，这些改革使得中国的平均关税水平从 15.9%降低到了 9.7%，并且限制了中国采取各种保护主义政策的空间。同时，WTO 还对出口补贴、知识产权以及市场开放等领域做出了具体规定。自 2004 年以来，美国已经向 WTO 提出了 21 起针对中国的贸易仲裁。根据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于 2015 年发布的一项报告，美国赢得了这些仲裁案中的大多数，有力保护了美国企业的利益。

当然，WTO 的裁决并不一定会导致真实的市场开放，事实上，WTO 对不愿意配合的成员国当局极度缺乏强制力。我们需要强调的是，为了落实 WTO 公平的贸易裁决，诉讼国也应该采取足够措施，来对被诉讼国施加压力。但是，在最近两起典型的诉讼案（分别涉及移动支付和图书影视销售业）中，美国政府并没有对中国施加应有的压力，以至于 WTO 的裁决并没有真正起到作用。

根据 WTO 的议事原则，如果诉讼国认为被诉讼国并没有执行 WTO 的决议，其有权对 WTO 提出追加上诉。如果追加上诉依然没有生效，诉讼国有权呼吁 WTO 成员国对被诉讼国发起贸易制裁。而在最近的几起案例中，美国政府没有采取以上任何一种措施。除了 WTO 之外，TPP 也为美国提供了一个调解与中国贸易关系的多边平台。尽管中国还不是 TPP 的成员国，但中国往往被视为是 TPP 潜在的申请国。不过，在特朗普总统上台并宣布美国退出 TPP 后，这个选项已经不复存在。

由于美国已经宣布退出 TPP，加之 WTO 本身的局限性，因此如今美国政府最好的选项就是直接与中国展开更密切的双边接触，并与中国直接建立新型经济关系。在过去几年，中美之间就各自关心的问题曾经有过相当频繁的接触，但这些接触基本都仅限于“对话”的层次，并没有达成任何实质性的成果。因此，美国政府现在需要的是与中国展开正式的双边谈判，以期达成实质性的贸易协定。考虑到中美之间的谈判议题是如此广泛，这种谈判很可能是旷日持久的。但是，包括澳大利亚、新西兰、加拿大在内的其他西方国家都已经与中国达成了各种双边经贸协定，可见这种谈判并不是不可想象的。

当然，中美之间的贸易谈判必然要比中国与其他国家的谈判复杂得多，但美国政府仍然应该尽早着手，下力气与中国达成正式的双边贸易协定。只要双方都拿出决心、智慧和创造力，我们有理由相信中美之间一定能够达成共识。

如果美国希望改善其与中国的经贸关系，并在贸易和投资领域与中国达成共识，美国政府就有必要进一步加深对中国的理解。在与外部世界的国际交往中，中国政府非常重视自己的面子问题。作为崛起中的大国，中国非常渴望获得来自美国的尊重、认可和互惠互利。这种期待集中地表现在中国官方对中美关系的定位：“新型大国关系”。在中国的定义中，这种关系意味着中美之间要“相互尊重，合作共赢”。因此，在双边贸易谈判中，中国会坚守本国的经济利益，绝不会对美国的需求亦步亦趋。同时，如果在谈判中美国政府采用了具有攻击性的谈判风格，中国政府很可能将之视为冒犯行为，并且损害其进一步进行谈判的意愿。因此在未来的接触中，美国政府有必要注意这些特征，加深对中国的理解，从而更高效地展开谈判。

在竞选期间，特朗普的竞选团队曾对中国发表过诸多富有攻击性的言论。而在现在的特朗普内阁中，也有一些重要官员以对中国相当不友好的立场而著称，比如著名的白宫贸易委员会主任 Peter Navarro，就是纪录片《来自中国的绞杀》（*Death by China*）的制片人。如果这些人的观点占了上风，那么美国与中国新型经济关系的构建工作恐怕就不得不往后搁置几年。不过，特朗普政府的团队中也并非全都是对华敌视的官员，有一些信号显示，特朗普总统也有意与中国保持积极接触，一个明显的例子就是对新任驻华大使的任命。众所周知，特朗普政府新任命的驻华大使，前艾奥瓦州州长 Terry Branstad 是习近平主席的旧交，两人的友谊可以追溯到上世纪八十年代。同时，最近财政部长 Steven Mnuchin 也发表了希望与中国保持“健康关系”的观点。如果这番表态可以代表白宫的话，那这对于中美双边谈判而言无疑意味着一番良好的外部环境。

尽管中美之间近年来存在有分歧和摩擦，但中美双方的国家利益往往是相容的，而不是相冲突的。因此，推进两国经贸关系向更深层次发展，无疑符合中美双方的共同利益。贸易战只会导致两败俱伤的恶果，因此特朗普政府有必要审慎审视中美的双边经贸关系，并采取行动，进一步深化中美两国的经贸关系，从而造福两国人民，维护双方的共同利益。

本文原题为“*It's time to negotiate a new economic relationship with China*”。本文作者 Simon Lester 和 Huan Zhu 是美国加图研究所（CATO）的高级研究员。原文于 2017 年 7 月发表在 CATO 官网。[单击此处可以访问原文链接。](#)

韩国成为特朗普贸易战略新的前沿阵地

Gary Clyde Hufbauer 和 Cathleen Cimino-Isaacs /文 侯书漪/编译

导读：自上任并打击了美国与中国、墨西哥和欧洲的贸易关系后，特朗普总统已经将其重心转移到重新谈判 2012 年生效的韩美贸易协定（KORUS）上。6 月 30 日与韩国总统文在寅（Moon Jae-in）会面时，特朗普说这样的会谈应“立即”开始。编译如下：

自上任以来，特朗普分别打击了美国与中国、墨西哥和欧洲的贸易关系，现在他已将其重心转移到重新谈判 2012 年生效的韩美贸易协定（KORUS）上。6 月 30 日与韩国总统文在寅（Moon Jae-in）会面时，特朗普说，双方关于 KORUS 的会谈应“立即”开始。首尔领导层的反应尚不明确，但即使特朗普最终从韩国赢得了一些新的让步，他的主要关注点——即两国间的贸易逆差也不可能有什么大的变化。这是因为，逆差主要由美国预算赤字的大小和美元的外汇价值而非贸易壁垒的程度决定。

无论是作为总统候选人还是任职期间，特朗普都称韩美贸易协定“非常可怕”，这是由于美国与韩国间存在巨大的商品贸易逆差（从 2012 年的 170 亿美元到 2016 年的 280 亿美元）以及韩国对美国汽车销售的壁垒。在私下谈判中，特朗普无视了总统文在寅对双边贸易协议的辩护。据 *Inside US Trade* 在 7 月 3 日透露，美国贸易代表将在即将召开的第一次 KORUS 联合特别会议上正式提出对协议的修订。到目前为止，我们仍然不清楚贸易协定是否会重新开放，并像新的北美自由贸易协定（NAFTA）的谈判那样得到国会监督，还是说“重新谈判”只会在某些部门产生分散的一次性交易议程，而这就不一定需要美国法律的变更。

无论与韩国谈判的最终结果如何，特朗普贸易战略的新手段或者说现有的几个方面几乎不可能对美国的全球贸易逆差产生重大影响。然而，在特朗普看来，贸易赤字是自里根总统以来的美国贸易政策成为一场灾难的决定性证据。

此外，韩美贸易协定与北美自由贸易协定的谈判一样定于九月开始，这意味着特朗普可能会采取“竞争性谈判”的策略。“竞争性谈判”将会从加拿大、墨西哥和韩国中比较出最好的提议，然后存在不足的国家将被要求改善他们的提议，否则可能会被迫终止与美国的贸易协定。

特朗普的贸易战略主要由“让所有美国人更自由、更公平地进行贸易”这一目标驱动。作为操作指南，特朗普试图减少美国双边贸易逆差（最好是通过扩大美国的出口，但如果必要的话也可以限制进口）和确保外国对美国出口的贸易壁垒不高于美国对同一产品的进口的贸易壁垒（也称为“镜像互惠”）。与此同时，特朗普似乎不愿意承认、更不用说消除那些从外国竞争中保护美国商品和服务市场的多重壁垒了。经济研究表明，在提升美国的经济繁荣方面，消除国内进

口壁垒可以起到和消除外国对美国的出口贸易壁垒一样（甚至更大）的作用。特朗普和他的贸易官员似乎忽视了这一研究。

如果美国的贸易伙伴同意在美国没有任何让步的情况下，扩大对美国商品和服务的购买，那么特朗普的战略可能会在这些国家获得一些新的市场准入。这一结果将受到美国出口商的欢迎。

特朗普希望每个贸易协定都是独一无二的，但特朗普的使者可能试图对加拿大、墨西哥和韩国提出一些重大需求，并希望一个国家的同意能促进所有国家的通过。什么样的建议可能属于这一类别呢？以下是一些例子：

- 在自由贸易协定伙伴之间的双边贸易不平衡问题上，要求盈余国家采取措施来增加其从赤字国家进口的承诺。
- 加强反对货币操纵和任何合作伙伴可能的货币低估，这是国会给美国贸易促进局的概述中的核心谈判目标。
- 新的药物知识产权保护，例如达成一家公司对新生物药品试验数据的 8 年甚至 12 年的排他性协议，以便有效阻止贸易伙伴生产美国药品的仿制药。这也是跨太平洋伙伴关系谈判中的一个中心议题。
- 在 10 年内逐步取消加拿大和韩国对美国农产品出口的壁垒（墨西哥的壁垒已经几乎被取消），除了美国坚持保护的产品，如糖、花生和烟草。
- 新的汽车贸易规则（关税、标准、原产地规则）以使得美国汽车和零部件的产量能接近于美国汽车行业的消费量。

到目前为止，特朗普的贸易战略并没有引发报复，但世界正越来越接近真正的贸易战。根据最新的全球贸易警报，到目前为止，美国 2017 年的政策变化已经 189 次损害了其他 G20 国家的商业利益，比 2016 年增加了 26%。如果特朗普政府根据其上任第一个“100 天”内的调查来施加新的进口限制，那么受到反倾销和反补贴关税等贸易限制的美国进口份额将从 2016 年底的 3.8% 增加到 2017 年的 7.4%。特朗普已经启动了新的美国进口限制计划，对备受瞩目的产品如钢铁、铝和太阳能电池板等进行限制。为了解决这一问题，特朗普已经成功地恐吓了跨国公司的 CEO，促使他们在美国建造或保留生产设施。

也许特朗普的气势将促使美国的合作伙伴采取温和开放市场的措施。例如，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和特朗普一起宣布了一个促进美国出口的 100 天计划，从牛肉销售和美国信用评级机构（穆迪，标准普尔，惠誉）的中国业务开始。类似的，如果韩国符合美国的安全规定，韩国从美国进口的汽车数量可能会翻倍——每个汽车制造商将从进口 25000 辆增加到进口 50000 辆汽车。加拿大可能会放宽（但不能消除）从美国进口牛奶和禽类的限制。墨西哥可能签署购买美国天然气的长期协议。

如果特朗普愿意将这些国家的妥协作为美国在贸易政策上的胜利，那相比发

生贸易战，这种方式会更受欢迎。但由于宏观经济因素——预算赤字、美元的高估和强大的美国经济，这种方式不会显著降低美国全球经常账户的赤字（根据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估计，美国的全球账户赤字将从 2016 年的 4810 亿美元上升至 2017 年的 5230 亿美元）。

随着事态的发展，如果特朗普对贸易赤字越来越失望，并转向大规模的单边贸易限制，那结果将不会令人满意。

本文原题为“South Korea is the new front in Trump’s trade strategy”。本文是作者是 Gary Clyde Hufbauer 和 Cathleen Cimino-Isaacs，前者在 PIIE（彼得森国际经济研究所）任 Reginald Jones 高级研究员，后者是 PIIE 的研究助理。本文于 2017 年 7 月刊于 bruegel 官网。[单击此处可以访问原文链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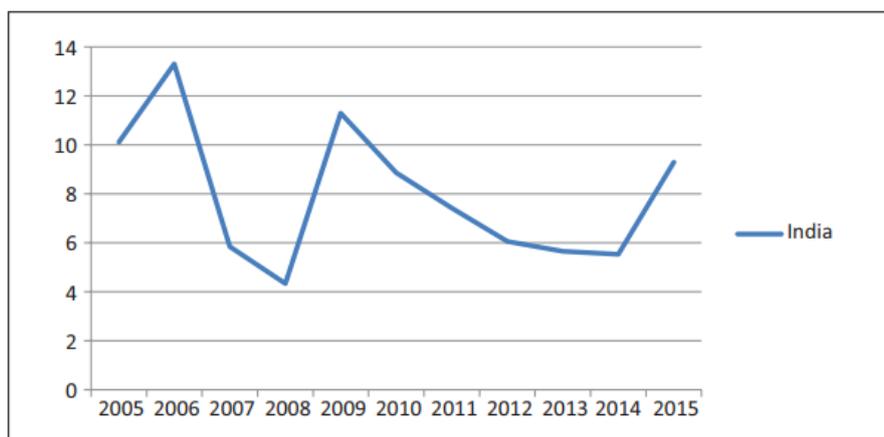
印度及其他金砖国家的制造业：表现不佳

Manmohan Agarwal/文 申劭婧/编译

导读：许多分析员认为，印度的制造业一直不如别的国家发展的好。它在印度 GDP 中所占比例较小且保持稳定。为此，印度政府一直努力试图改变这一状况。本文将印度的制造业放在全球经济的背景下进行考察，并根据相关分析提出了可能提振其发展的一些可能方法。编译如下：

尽管发展中国家的宏观经济增长即使在 08 年金融危机后依然较为乐观，制造业发展却一直不尽如人意。在低收入国家，1974 到 2000 年以来制造业在 GDP 中所占比例一直停滞。经过 2001 到 2007 年的增长之后又重新回落，2011 到 2015 年增速甚至低于 1983 到 1990 年。中等收入国家的状况也与此相似。这种先增长又重新低迷的情况事实上适用于大多数发展中国家，只不过趋势扭转的时间点各不相同。金砖国家的模式与其所处的区域相同。巴西和南非制造业在 GDP 中比重经历了 1983 到 1990 年的上升之后剧跌到以前的一半左右。俄罗斯也在数据可得得有限时间内经历了下滑。在中国，经历了 1974 到 1982 年的增长期后，制造业比重同样开始稳定而缓慢的下跌。而在印度，金融危机以来，制造业比重虽然保持震荡，但总体呈现增长趋势。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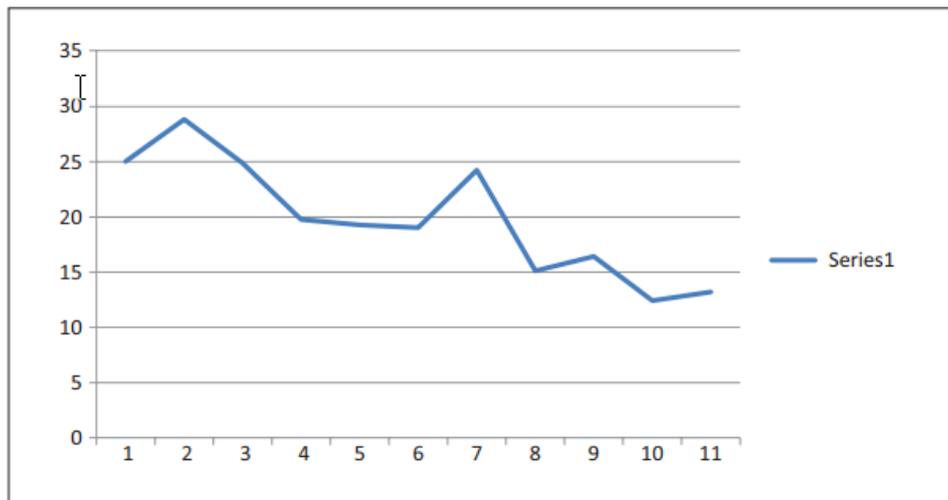
与其他发展中国家，包括金砖国家相比，印度的制造业发展并不算差。然而，从 2005 年到 2014 年，总体来说该行业呈现出下降趋势，特别是 2006 到 2008 年以及 2009 年到 2014 年（图 1）。



Source: Based on data from the World Bank Development Indicators.

图 1. 制造业年度增长率，2005-15

在这样的整体形势下，我们重点来看最大的 300 家公司表现。在这 300 家公司中，我们主要关注工业类型公司，而银行业，金融业和媒体业的公司不做考虑。同样，我们排除了只能得到几年数据的公司。这样，有 164 家公司成为最终考察对象。我们计算了他们 2005 到 2015 年间的简单年度不加权价值回报率 (RNW) (图 2)。RNW 在这段时间内呈现出了明显的下降趋势。但 2011 年有一个提升，并且在此之前的三年 RNW 一直在 19% 附近保持稳定。因此，2011 年可以被认为是一个断点。2005 年到 2011 年平均 RNW 是 22.7%，而 2012 到 2015 年则是 14.4%。如果我们用资本回报率来替代 RNW，结果也是相似的。



Source: Author's calculations from data in progress.

图 2. 大制造业公司净价值回报率

同样的趋势也发生在其他子行业之中。我们计算了 2005 到 2011 年和 2011 到 2015 年的平均 RNW，发现在所有行业中第二阶段都要更低。如果我们只关注纯制造业，排除建筑和房地产业，IT 软件也和通信业，结果仍然如此。更重要的一个发现是，即使回报率相差不是那么大，呈现下降趋势的公司也要远多于呈现上升趋势的公司。

接下来我们分析了大公司的增长。我们从 200 家最大的公司中挑出共 111 家制造业公司，并将其划为三组。第一组在 2005 年 12 月到 2014 年 12 月间股本增长小于总固定资本平减指数增长。广义来讲，这些是在这段时期内实际股本下跌的公司。实际 GDP 在这段时期内不止翻了一番。第二组是股本名义价值增长小于固定资本形成总额(GFCF)通胀率结果和 GDP 实际增长的公司。这些公司在这段时期内对 GDP 贡献程度下降。第三组是股本增长快于实际 GDP 增长结果和 GFCF 平减指数的公司。我们发现，111 家公司中，有 62 家属于第一组，即实际

股本在这段时间内下跌的。31 家属于第二组，而只有 18 家，也就是 16% 的公司属于快速增长的第三组。总之，大多数大公司都增长缓慢，因为资本回报在不断降低。

接下来分析的是销售和资本回报之间的关系。利用 164 家制造业公司，我们生成了一个动态面板。因变量是净价值回报，回归因素是滞后回报，当前销售和滞后销售。销售变量被定义为公司销售在销售业子部门中大公司群体销售总额的比例。得出的回归方程如下： $\text{利润} = .935 \text{ 利润}(-1) + .990 \text{ 销售} - 1.241 \text{ 销售}(-1)$ 。

总体回归方程是显著的。但是子啊各个回归因素中只有之后利润是显著的。当前销售与当前利润正相关，但是滞后销售是负相关。这种负相关关系说明占大份额的公司将面临更多竞争，利润也更可能被蚕食，然而，没有一项销售因素是显著的。

如果用利润来做回归因子预测销售，回归方程为： $\text{销售} = .921 \text{ 销售}(-1) - .020 \text{ 利润} + .001 \text{ 利润}(-1)$ 。滞后销售十分显著，滞后利润也显著，而且为负。提高一家公司在整个行业中的销售份额对利润有负面影响。如果想提升销售比例的话，需要更多的销售开支或者价格折扣。

两个方程中，利润和销售份额之间的负相关关系以及滞后变量小于 1 的系数都表明存在着均值回归现象。市场领导者很难保持自己的地位。

增长缓慢的印度制造业都让人担心其能否创造足够的就业机会。但是我们发现，全世界的制造业都面临困境，而印度表现实属不错。然而，我们也确实意识到，在 2005 年到 2014 年期间，制造业的增值增长一直放缓。这一时期内，最大的制造业公司门的回报率在所有子部门都已下滑。这可能与激烈的市场竞争有关，另一可能因素是因为新兴生产设备投资率低下导致的生产能力增长的放缓。长期资金可用性与为回应竞争及投资需求导致的短期内投资刺激间的矛盾关系需要更多政策干预，以便能够提振制造业的增长率。

本文原题为“Manufacturing in India and other BRICS countries: a stuttering performance”。

本文作者 Manmohan Agarwal 为 RIS 教授。本文于 2017 年 6 月刊于 RIS 智库官网。[单击此处](#)可以访问原文链接。

中国 BIT 进程及对中加 FTA 谈判的启示

Yong Wang / 文 许平祥 / 编译

导读：中国双边投资协议谈判和单边自由化的进程已经取得非常大的进展，这将为中加自由贸易协定谈判提供一个稳定的区域和世界贸易环境。编译如下：

自英国脱欧和美国特朗普当选以来，贸易保护主义甚嚣尘上。作为第二大经济体的中国如何应对威胁，不仅关系到自身的利益，而且会影响全球经济的发展方向。2017年1月17日，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瑞士达沃斯世界经济论坛年会上发表主旨发言，强调中国是全球化和世界贸易秩序的捍卫者，并将继续向世界开放。尽管中国能否成为全球经济的领导者是未知的，但是推动经济的进一步开放是唯一的选择。自习近平领导的领导层上台以来，中国逐渐形成了外向型的经济战略。

随着中国最新的双边投资协议谈判和单边投资自由化的进程取得进展，中国市场的外商投资企业的经营环境得到改善。在此基础上，即将进行的中加 FTA 谈判前景一片大好，有望在比预期更短时间内达成协议，并且保护主义威胁下的世界经济秩序也将得到治理和维护。

中国双边投资协议谈判进展：进入新一轮谈判

中国已经签署了 100 多个双边投资协议，大部分是在 20 世纪 70 年代末开始改革开放之后完成的。其中 78 个与发展中国家签署，26 个与发达国家签署，包括德国，英国和加拿大（彼得森国际经济研究所（PIIE），2015 年）。这些协议几乎都是为了保护投资后的权利，而对投资者的预设市场准入权排除在外。

中国的新一轮双边投资协议除了强调投资保护外，也将重视市场准入和开放。中国同意以准入前国民待遇和负面清单为基础，开展中美双边投资协定（以及中国、欧盟双边投资协议）。同时，中国更愿意适应 2012 年美国模式的双边投资条约案文，包括知识产权，劳动和环境保护等更多问题领域（梁和东，2013 年）。以下因素可能说明了中国在与美国和欧盟双边投资协议谈判中纳入开放条款的立场。

首先，自 2008 年全球金融危机以来，在中国投资的美国和欧盟的公司，面临要求市场准入的压力越来越大。他们对中国以创新激励，补贴和政府采购的形式支持国有企业的政策深感关切。这些外国公司能够促进中国市场的开放，并在投资活动中扩大他们的影响力。第二，中国决策者认为，可以利用高标准的双边

投资条约来降低中国在东道国面临的外来投资障碍。中国投资者越来越多地呼吁政府通过与东道国的高标准协议谈判来加强贸易保护。第三，中国经济一直处于“新常态”，应着眼于增加消费和创新，确保成功转型。外商投资企业放宽市场准入具有很大的潜力，需要引进技术和技能，特别是服务业和高端制造业。最后，新一轮双边投资条约应有助于缓解来自美国大规模的自由贸易协定的竞争和压力，包括中国没有参与的 TPP 和跨大西洋贸易和投资伙伴关系。

中国领导层确定了明确的目标：中国应在全球经济治理中发挥主导作用，为了实现这一目标，国家应进一步开放经济，争取重塑二十一世纪贸易和投资的国际准则（He, 2016; Wang, 2016）。显然，国家采取了积极的措施来平衡 TPP 贸易转移的影响。

与美国和欧盟进行双边贸易谈判的比较

中美双边投资协定谈判于 2008 年启动，经过几轮谈判，两国在国有企业的地位，知识产权保护，透明度和标准制定等核心问题上的分歧并没有减弱。2013 年 7 月谈判取得了重大进展，中国同意以外商投资管理负面清单为基础与美方进行谈判（白，2016 年）。中国在市场准入方面的大幅让步使谈判走上了快车道。负面清单应该是来自不同监管机构的综合报价，可能会对各行业的“既得利益”产生更大的影响力。双方确认了“建立非歧视，透明，公开投资的共同目标”的高层协议。目前，美国商界对美国政府的压力不大，这不仅仅是一个较短的负面清单，而且还涉及 2012 年美国模式双边投资条约中不包括的许多问题，如中国有关数据流量和其他数据相关要求的规定，国有企业，歧视性地执行反垄断法和强制技术转让。美国商业代表称，他们更关心双边投资协定的质量和范围，而不是谈判结束时（Caporal, 2016）。USTR 承认中国在双边投资协议谈判方面的努力是“全面参与”，但抱怨说“中国尚未决定充分减少投资限制，以便能够圆满结束谈判”（USTR 2017）。特朗普政府的“美国第一”政策和美国商界的更高期望将不可避免地延长美中双边贸易谈判进程。

与中美双边投资协议谈判相比，中国、欧盟双边投资条约谈判进展相对缓慢。在 2013 年双边投资协定谈判开始之前，中国在 1980 年代和 90 年代与欧洲国家签署了一些 BIAs，主要关注投资保护，而不是在市场开放。为了应对中国市场的新挑战，欧盟积极推动重点关注市场准入，透明度，劳动待遇，环境投资仲裁等高标准自由化问题的中欧双边投资协议谈判（白，2016）。不幸的是，中欧双边贸易谈判会谈尚未取得重大进展。其中，主要有两个原因。其一，虽然欧洲工业坚持中国符合市场准入互惠原则，但中国在欧洲投资额的不断上升，使欧盟

国家开始担忧。第二个更重要的因素是由于不同的要求，欧盟成员国之间的内部协调十分困难。例如，欧盟发达国家成员优先保护中国的投资利益，而中欧和东欧成员更关心吸引中国的投资。

单方面自由化：中国双边投资条约风险准备

2013 年新任领导上任不久之后，在上海引进了试点自由贸易区（PFTZs），于 2015 年在天津，广东和福建相继推出。PFTZ 并非主要侧重于贸易自由化，而是侧重于放宽与外商投资有关的规定，涉及根据负面清单设立外商投资企业；服务贸易；资本管制；中国人民币兑换率，人民币兑换率；提高知识产权和贸易便利化的标准。政府行政结构和程序的精简也是其中一部分。中国在促进外商投资自由化方面的单方面努力，符合过去三十年渐进式改革开放的做法和经验（马 2008；刘 2008）。

改革开放以来不同时期的政治领导人强调，中国作为人口众多的发展中国家，应该在实施之前尝试和测试改革开放政策的每一步。例如，监管机构要求警惕地应对开放金融市场对于外国投资者的潜在风险，这种风险容易转移到整个经济体系。但是，随着双边投资协议谈判的进展，特别是中美两国之间的协商进程，PFTZs 的延伸和单方面的投资自由化是相辅相成的。

在政治领导人的眼中，双边投资协商会议的谈判让他们通过承诺履行对外债务的方式，对国内改革施加压力，正如中国在加入世界贸易组织时所表明的一样，这刺激了国有企业和政府制度的改革。双边投资条约谈判也符合中国改革的政治逻辑（中国政府网 2016）。

虽然中国在中美双边投资协议谈判（主要是以负面清单为前提的国民待遇）方面作出了重大让步，但已经通过多次努力，缩小了对外商投资企业进入市场准入的负面名单。为准备 2016 年底与美国缔结双边投资协定的情况，中国立法机关全国人大投票决定修改与中国有关外资企业有关的四项法律，授予外商投资企业预售国民待遇权和负面清单。虽然执法细节尚未出台，但相信外商投资企业将在中国获得更多的机会（孙，2017）。单方面投资自由化的结果令人鼓舞。

对中加自由贸易区谈判的影响

在政策规划方面，中国政府希望自贸区谈判能够跟随美国和欧盟双边贸易谈判会议，双边投资条约和自由贸易协定能够深化三大贸易国家之间的经济相互依存关系。

目前由于欧美的严峻现实，至少在短期内，这个蓝图在政治上更难实现。但有一点是肯定的：中国将进一步开放经济，采用更高标准的双边投资条约，建立自己的国内和国际自由贸易协定网络。通过双边投资条约谈判和单方面的自由化，中国有信心能够为包括投资领域在内的贸易伙伴提供更大的让步。

在美国退出 TPP 和保护主义上升的背景下，中国制定了扩大金融，教育和文化部门市场开放的计划，放宽了养老金，建筑，设计，会计，审计和电子商务等服务业的外商投资（国务院 2017 年）。

尽管特朗普政府在未来双边投资条约的某些方面出现了不确定因素，但中美贸易关系的发展有可能被纳入双边投资条约协议。到现在为止，加拿大和中国对外投资保护协议在 2012 年被认为是中国最高标准的投资协议。虽然不确定中美两国将会在双边投资条约谈判中达成一致意见，但中国已经承诺以缩小的负面名单为外资企业提前设立权利，这表明该国有意向外国投资者开放市场。

中国接受单边自由的新一轮双边投资协议无疑将使即将举行的中加自贸贸易谈判进入更有前景和开放的环境。具体来说，根据中国制定和实施的双边投资条约，双方可能会更容易就投资和服务贸易达成协议。

虽然预计两国在接受中国国有企业对加拿大的投资以及对外资企业的限制方面可能有所不同，例如中国市场的本地化，但鉴于美国当选后的区域和世界贸易秩序面临严峻挑战，中国和加拿大在发起和加快自由贸易谈判方面有更多的理由和迫切的需要。如果双方都愿意作出让步，那么中加谈判的时间要比中澳之间的时间短。

本文原题为“China’s BIT progress and implications for China-Canada FTA talks”。本文作者 Yong Wang 是全球经济计划的 CIGI 高级研究员。同时，他是国际政治经济中心主任，也是北京大学国际研究院教授。本文于 2017 年 4 月刊于 Policy Brief 。[单击此处可以访问原文链接](#)

香港：两阶段的经济实验

Neil Monnery / 文 杨茜 / 编译

导读：战后的香港生活水平显著提高，这一转变被米尔顿·弗里德曼视为自由经济对经济增长潜在影响的实验。本文评估了郭伯伟爵士自由放任政策的贡献。这一政策奠定了香港的成功，受到弗里德曼的推崇。此外，本文还探讨了香港回归中国的二十年来，香港经济的第二阶段实验是否应该继续进行。编译如下：

20年前英国将香港的主权归还给中国。1976年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弗里德曼将该地区视为一个实验，研究自由市场对经济增长的影响。

在这个实验中，弗里德曼以英国为比较对象。他注意到在战后数年，英国对香港采取的更多是干涉主义和由国家主导的政策组合。他的结果显示：1960年香港的人均收入是英国的28%，而1997年这一比例达到137%。

弗里德曼认为造成如此巨大差异的关键是自由放任的经济政策。这一经济政策是由约翰·郭伯伟爵士奠定的。英国派约翰·郭伯伟先生出任香港财政司。当时英国在向社会主义福利国家靠拢，郭伯伟则坚持奉行自由放任政策，包括拒绝提高关税，并维持低税政策。

随着更多的历史数据，我们可以重新审视弗里德曼的实验。

用实际收入衡量（以美元计算的国际购买力），我们对香港的成功会有类似但稍有不同结论。1950年，香港的人均收入低于英国的30%。而到1997年，它比美国和瑞士高出40%。这表明香港经济仍然获得了显著增长。

经济方面的发展在其他地方也有相应的体现。1950年，英国人平均比香港人长寿五到六岁。而现在香港人的平均寿命比英国人还多两年。在全球教育评估测试中，香港排名靠前，而英国通常排在二十名左右。

弗里德曼对约翰·郭伯伟表示了极大的敬意。他是奠定香港经济基础的中心人物。他的继任者夏鼎基爵士也奉行类似的政策组合，并将之称为“积极不干预主义”。

“积极不干预主义意味着政府试图分配私人部门的资源对开放经济的增长率来说是徒劳无益的，这一做法同时阻碍了市场的运作力量。”

即使在今天，郭伯伟的低税率、政府盈余及自由贸易的原则都已写入香港的基本法。

但是，郭伯伟并非完全不干预市场。他主张政府监管或参与提供公共物品，如供水和基础设施。同时他努力寻求公私合作的正确方式。在缺乏完全竞争市场时，他希望通过积极监管来控制公司的行为。

自由放任主义最大的分歧在于房地产市场。今天，约有三分之一的香港人租住在政府建造的公寓，而全港半数以上的公寓都有政府所有权的要素。

这一令人惊讶的情况是发生在战后大量移民涌入香港时。由于没有地方住，蔓延的棚户区如雨后春笋般冒出来。1953年，发生在棚户区的一场大火致使50000人一贫如洗。政府开始了庞大的建房计划。他们建的公寓很小很简单，但这些公寓是安全且居民负担得起的。这些公寓仍然给政府提供了较小的投资回报。

现在拥有的证据加上20年的数据，我们可以更好的评估弗里德曼的实验。但最终结论是相同的。

毫无疑问，战后香港生活水平的提升是世界历史上最显著之一。任何有兴趣了解提高生活水平的经济学家或政策制定者，都应该深入了解这个故事。毫无疑问，这是郭伯伟的经济政策框架和具有创业精神的人们结合在一起的结果。

但香港是否要进行第二次的后续试验呢？自二十世纪五十年代以来，香港的经济政策是显著稳定。其中一个要素就是商业运作的体制框架。香港拥有强大的法律制度、法治、产权界定和高度的经济自由。

当前，香港地区有些人认为上述一些因素正在被削弱。这些因素被认为提供了强大的经济增长平台。但是香港从来都不是民主的，无论是先前作为英国殖民地，现在作为中国的特别行政区，它的独立民主总是有限的。尽管是有限的民主，但香港的经济自由度却一直名列前茅。

人们希望香港继续民主下去。但如果政策制度动摇了，则会给经济增长的前景带来潜在风险。

本文原题为“Hong Kong: A two-stage economic experiment”。本文作者 Neil Monnery 为英国阿什里奇战略管理中心主任。本文于2017年6月刊于VOX官网。[单击此处可以访问原文链接。](#)

中国钢铁过剩产能的估计

Zhiyao (Lucy) Lu/文 郭子睿/编译

导读：传统测量钢铁过剩的方法来源于世界钢铁协会，忽视了季节性因素和某些特殊的时期，钢铁厂更新设备需要保持一定数量的“闲置产能”。2015 年底，中国实际的钢铁过剩产能是 1.28 亿吨，远远小于经常被引用的 3.28 亿吨。在评估中国钢行业过剩产能时，需要注意一部分产能的削减是发生在铁行业，而且同时会有新增产能。编译如下：

过去的数十年，中国的钢铁产量迅速增加，但产能增加的速度更快，导致钢铁产能过剩。过剩产能是指能用于生产但没有投入生产的产能，中国的钢铁过剩产能通常认为在 3.25 亿到 3.5 亿吨。但我们认为中国的过剩产能大概在 1.3 亿吨。

估计过剩产能：新的方法

被广泛引用的过剩产能数据 3.25 亿到 3.5 亿吨来源于世界钢铁协会，通过对原钢产量取差分获得。根据这一方法和数据，截止到 2015 年底中国钢铁行业的过剩产能高达 3.28 亿吨。但这一方法高估了中国的钢铁过剩产能。

为什么？季节性因素和某些特殊的时期，钢铁厂更新设备需要保持一定数量的“闲置产能”。因此，钢铁厂不可能全负荷运转，产能不可能完全利用。也即是说，之前估计的 3.28 亿过剩产能有一部分是必需的“闲置产能”，并不都是过剩的。

在正常条件下，产能利用率 80%是正常的。2015 年钢铁产能将近 8 亿吨，闲置产能 2 亿吨是合理的。采用这种方法，2015 年底，中国实际的钢铁过剩产能是 1.28 亿吨，远远小于经常被引用的数据。供给侧改革应该削减产能 1.3 亿吨，而非 3.5 亿吨。

产能和产能削减：在 2016 年的发展

截止到 2015 年底，中国的原钢产能是 11.3 亿吨，中国生产 7.98 亿吨，产能利用率是 70.9%，远远低于金融危机之前的 85%。如果合理的产能利用率是 80%，中国的过剩产能应该是 1.28 亿吨。过去的几年里，削减过剩产能的发展如下：

2016 年 2 月 1 日：国务院发布《钢铁行业降低过剩产能，解决今后发展困难的指导意见》。改指引设定在 2016-2020 年每年削减原钢产能 1000 万吨到 1500 万吨，而且禁止地方政府批准扩大产能的项目。2016 年 6 月，国家发改委宣布 2016 年目标削减 450 万吨钢铁产能。2016 年 11 月 4 日，工业和信息化部发布钢铁行业 2016-2020 调整升级计划。2017 年 3 月 5 日，中国总理李克强在政府工作报告中再次强调首要任务是削减煤炭，钢铁行业的产能。自从国务院在去年 2 月发布指导意见以来，相关的部委发布相关的 8 个文件，覆盖税收，环境，融资等促进去产能的举措。

有两点值得注意：第一，国务院和工业信息部公布的削减目标 450 万吨包括钢和铁两个行业，而不是单独某一个部门。这样我们很难对比分析钢产能削减的目标是否完成。为了更明确的处理产能削减以及采取有效的措施，我们建议中国政府应该为这两个部门分别设置目标。第二，中国的文件大多是公布总产能变化数据而非净产能变化数据。显然，当一些产能被削减，导致总产能降低；如果新产能增加，总产能会增加。因此，中国应该分开公布被削减的产能和新增的产能，以及导致的净产能变化，才能更好的评估中国的去产能进展。

合理的评估中国钢行业的过剩产能

如果上述两点不能得到纠正，很可能导致错误的评估中国的钢行业的过剩产能。在 2015 年底，中国的生钢产能是 11.3 亿吨。中国在 2016 年削减钢和铁产量 650 万吨，并计划在 2017 年再削减 500 万吨。假设所有的产能削减都在钢部门，而且没有新钢产能的增加，那么中国可以在 2017 年底达到之前设定的目标。

基于这些假设，在 2016—2017 年，中国将会削减 1150 万吨的钢产能。因此，到 2017 年底，中国生钢产能将会到 10.1 亿吨，产能利用率将会 79.1%，这和工业信息部设定的目标基本一致。当然这只是一种乐观的情形，如果考虑到上述产能的削减一部分发生在铁行业，而且会有新产能的扩大，到 2017 年底产能利用率会远远低于 79.1%。

本文原题为“China's excess capacity in steel: a fresh look”。本文作者 Zhiyao (Lucy) Lus 是 PIIE 研究员。本文于 2017 年 7 月刊于 PIIE 官网。[单击此处可以访问原文链接。](#)

中国经济增长的测量偏误

Hunter Clark, Maxim Pinkovskiy, Xavier Sala-i-Martin / 文 安婧宜 / 编译

导读：2015 年以来，很多华尔街分析师认为中国官方公布的 GDP 数据高估了当前中国经济增速，从而建立模型自行计算中国经济增速。本文为摆脱传统预测中的测量偏误，选择建立夜间灯光强度的指标与经济增长的相关关系，从而评估官方数据是否出现高估。编译如下：

对于中国经济分析，国家官方 GDP 数据的准确性问题总会引起担忧，使得人们转而研究其它指标。一些非官方的测量显示，官方给出的增速是被夸大的，但是我们的研究不支持这一结论。我们的研究使用的指标是卫星测量中国夜间的光照强度，这是一个估计 GDP 增速很好的指标，因为它不会被官方经济数据影响而产生测量偏误。

关于数据的疑惑

在很多观测者眼中，六月份股票市场的震荡和八月份人民币的贬值表明中国经济似乎在 2015 年就陷入了混乱。但是，官方数据显示 GDP 增速仅从 2014 年底的 7.2% 下降到 6.8%。金融媒体对这些“可疑”的数据提出了怀疑，他们常常引用李克强 2007 年时任辽宁省党委书记时与美国大使 Clark Randt 交流期间使用的错误数据。李克强也承认他采用电力生产、铁路货运和银行贷款的平均增速来估计了辽宁经济，并且补充官方数据也是“人为估计”的，且“仅供参考”。

李克强指数在过去六年间有四年出现下滑，也记录了 2015 年经济的惨淡沉降。这些信号使得许多人相信中国的经济要弱于官方数据的记录（尽管李克强指数在 2016 年提上升了）。

很多华尔街的分析师怀疑官方数据，于是构建了关于中国经济增速的模型，将李克强指数与零售业、建筑业和其它经济活动结合。这些数据表明中国经济增速在 2015 年的最后一个季度确实低于官方发布的 6.8%，“真实的”增速数据低于 5%，甚至低于 3%。

卫星读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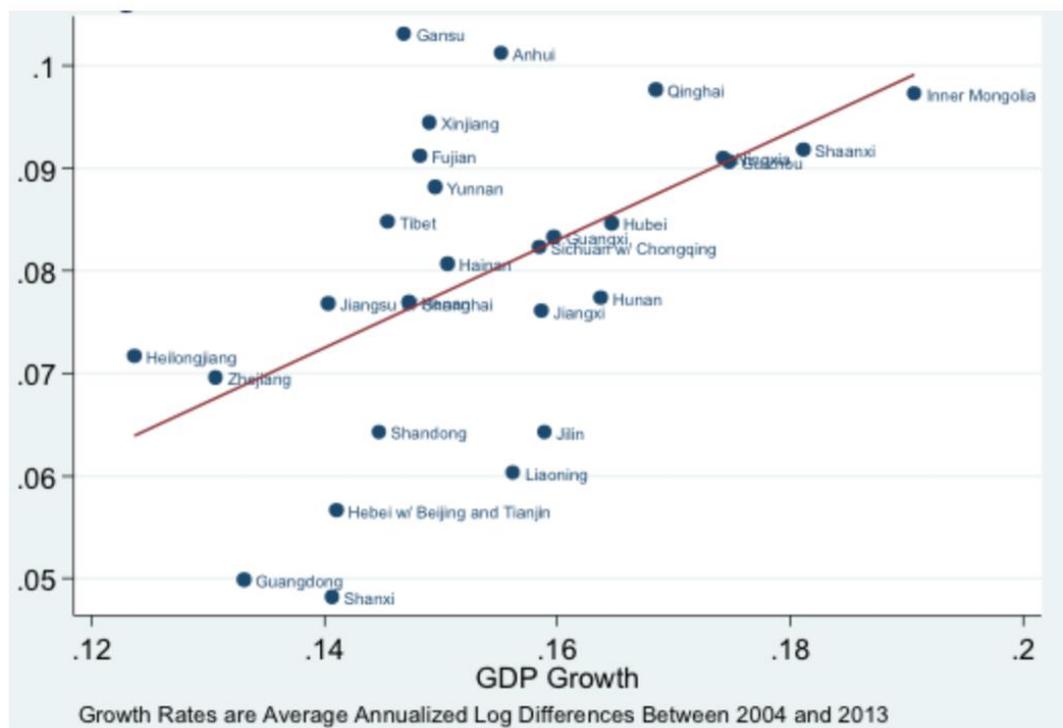
为了解决这些问题，我们需要建立一个透明的、数据导向的模型来独立测量中国经济增速——一个测量偏误与李克强指数无关的模型。我们认为这样的独立指标为卫星记录的中国城乡夜间灯光照明情况数据。夜间照明强度是测量经济增速很好的指标。通过测量不同经济变量与夜间照明强度的相互关系，我们可以发现哪些指标更加可靠。

测量夜间灯光强度的工作因天气和大气扰动而更加复杂，因为它们会影响卫星捕捉灯光强度的能力。这种测量偏误与传统数据的测量偏误不同，因为传统数据的测量受限于人为偏误和统计机构的错误，以及在某些情况下受限于政府官员或政治明星的操作。因此，夜间灯光作为“独立指标”来表明传统数据的质量是相对实用的。

我们研究的中心像之前报告提到过的一样，是用中国城乡夜间灯光强度增速来评估长期以来李克强指数计算增速时使用的数据以及其它华尔街分析师使用的数据。在我们的假设下——灯光的测量偏误与传统变量的测量偏误不同——我们获得的回归系数与实践运用的真实权数成正比，以预测中国 GDP 真实增速。

这一假设认为真实 GDP 增速与夜间灯光增长间有一系列相互关系。特别是只要真实 GDP 增速与夜间灯光强度增速是相关的，我们就可以允许相关系数随着时间和地区变化。官方 GDP 增速与夜间灯光强度增速如表 2 所示。我们的回归也加入了灵活的变量，可以适应全国范围内夜间灯光强度的变化。比如，如果中国灯光技术在我们的统计期间发生变化，导致中国所有电灯亮度都成比例增长，这一因素的权重与新 GDP 增速的相关关系将不会受到影响。

Figure 2 Lights growth and GDP growth in Chinese provinces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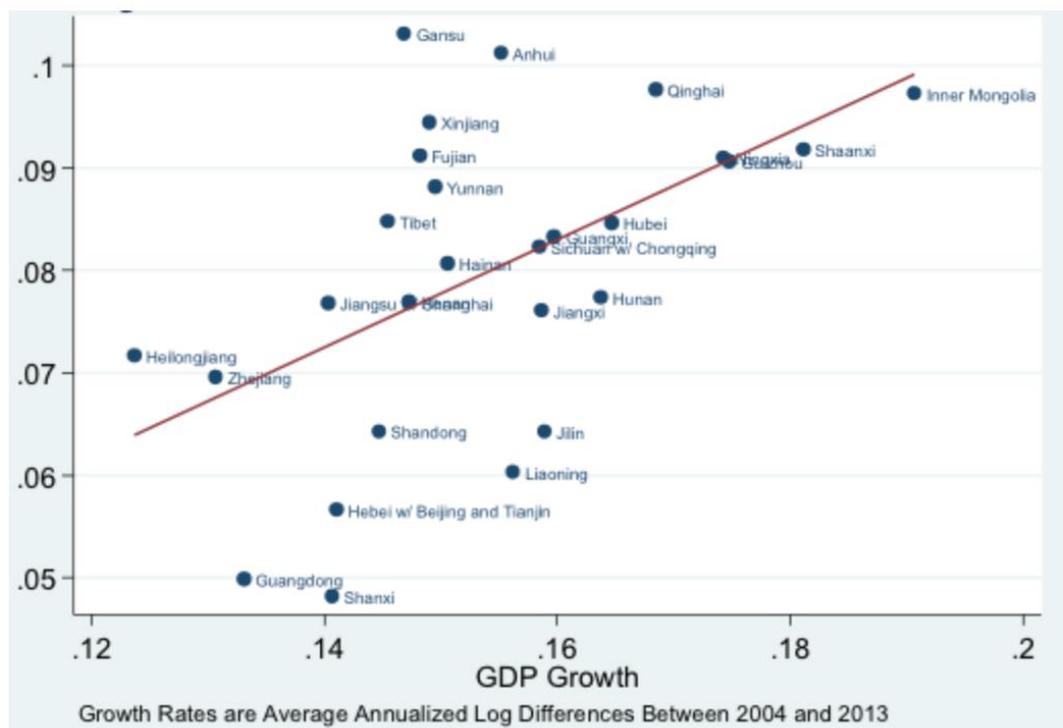


改写李克强指数

我们发现李克强指数对不同行业不应该赋予相同的权重。事实上，我们的研究显示，银行借贷增速应该被赋予铁路货运 6—8 倍的权重，而电力生产的权重应该介于两者之间。在附加假设下，这样重新分配估计中国经济增速权重的方法意义深远。我们发现 2012 年以来，中国 GDP 增速从未低于官方发布的 GDP 增速，甚至在一些年间比官方发布的 GDP 增速更高。在李克强指数中加入其它行业并不会影响这一结果。

图 3 代表了中国官方 GDP 增速与修正李克强指数的变化路径。我们为这一预测取了 95% 的置信区间。

Figure 2 Lights growth and GDP growth in Chinese provinces



回顾 2015 年末的预测，我们有理由反驳华尔街彼时对于中国经济放缓的担忧，因为中国经济增速不会低于 6%。相反的，我们无法怀疑中国官方数据的准确性。鉴于中国 2012 年经济增速水平接近 2005-2012 年的平均水平，我们也无法反驳自 2012 年以来中国官方数据低估了经济增速。我们的结果与 Rosen and Bao (2015) 相同，他们也认为中国服务数据低估了服务业规模。他们同样认为李克强指数铁路货运应占用更少的权重。鉴于中国经济越来越以服务业为导向，传统李克强指数会向中国经济释放错误信号。事实上，尽管官方数据显示经济增速保持不变，我们对于中国经济的估计表明 2016 年经济增长会加速。

理解我们数据的局限性很重要。我们发现中国经济不像一些分析师宣称的那样糟糕，目前也未经历剧烈下滑，但是我们不能认为目前的状况会持续下去。事

实上, 银行借贷增速长期以来一直是中国整体经济的缩影, 这引发了一系列担忧。如果未来借贷因某些原因下滑, 中国经济就可能会陷入巨大的漩涡。除了这些亟待解决的风险, 我们的研究认为目前中国官方经济增长的指标未出现系统性的高估。

本文原题为“On the measuring and mis-measuring of Chinese growth”。本文作者为 Hunter Clark, Maxim Pinkovskiy, Xavier Sala-i-Martin, VOX 经济学家。本文于 2017 年 7 月刊于 vox 网站。[单击此处可以访问原文链接。](#)

央行前瞻性指引的悖论

Silvia Merler / 文 史明睿 / 编译

导读：经济学术语中用“前瞻性指引”一词来形容中央银行关于未来政策利率可能的路径。标准的货币模型意味着前瞻性指导对当前的结果有巨大的影响，而最近的文献一直试图找到这种论断与现实的一致性。全文如下：

Negro, Giannoni 和 Patterson 记录了前瞻性指引发布对金融市场数据和专业预测的影响。他们发现，联邦公开市场委员会（FOMC）的声明包括前瞻性指引在内具有异质效应，而且一旦声明中的其他因素得到控制，前瞻性指引将对产出有积极的影响和通胀预期。他们还表明，使用这一基准时，标准中等规模的 DSGE 模型往往会高估前瞻性指引对宏观经济的影响。他们将这种现象称为“正向引导难题”，并认为将永续青年结构纳入基准测试可以解决问题。

Kiley 认为，常见的价格粘性的新凯恩斯主义模型在以零作为下限的环境中的行为不同。不仅在数量上，正向引导的乘数也可以非常大。积极的供应冲击，如提高生产力，将使产量下降，增加价格弹性可能加剧这种产出的下降（以及放大其他冲击的影响）。他发现这些结果是脆弱的，它们会在粘性价格（粘性信息）的合理替代之下消失：财政和货币乘数会减小，正面的供应冲击会使产量提供，价格会具有更大的灵活性，更新信息会变得更频繁，经济活动会沿新古典主义的方向变化。

Di Bartolomeo, Beqiraj 和 Di Pietro 研究了当中央银行使用前瞻性指引时，对宏观经济变量的动态影响。粘性价格模型意味着未来的前瞻性指引对当前的结果产生了巨大而难以置信的影响，这些结果提升了前瞻性指引效力难题的前景。他们通过在有限理性和异质代理人假设下的宏观模型，发现实际变量和名义变量的变化是较为温和的。

McKay, Nakamura 和 Steinsson 还研究了为什么一般货币模型意味着未来的前瞻性指引对当前的结果有巨大的影响，这些影响随着前瞻性指引的范围扩大而增长。他们提出一种模型，其中前瞻性指引对完全市场的假设高度敏感。当代理人面临收入风险和借款限制时，预防性储蓄效应会使他们对未来利率变化的反应产生影响。因此，前瞻性指引刺激经济的力量大大减弱。

中田强调了前瞻性指引的潜在时间不一致，并提出声誉作为解决不一致的一种方式。中田的模型将声誉理论与一般粘性价格的宏观经济模型相结合。如果中央银行对自己长期保持低利率政策的承诺反悔，虽然可以在短期内消除通货膨胀和产出过剩，但这一做法会失去声誉，私营部门今后不会相信在未来经济衰退中的类似承诺。代替的是，私营部门认为中央银行将遵循相机抉择政策，中央银行

失去执行承诺政策的能力。由于相机抉择政策导致的通货膨胀和产出缺口比承诺政策更糟糕，对声誉的关注激励了中央银行履行其承诺。但是，承诺政策只有在危机概率足够高的情况下才可信。

英国央行的 **Haberis, Harrison** 和 **Waldron** 探讨了前瞻性指导对下限为零证券的影响，这种围绕加息日的不确定性体现在：（i）前瞻性指导兑现的时间不确定（ii）沟通的不完全。运用新凯恩斯主义模型，他们证明了在对利率更敏感的经济体中，如果前瞻性指导出现推迟，那么这种释放加息信号的引导就不会产生更大的影响，并且如果一再推迟加息导致市场认为可能违背前瞻性指引，这种加息的前瞻性指引反而不会产生任何刺激。**Haberis** 等人还研究了联邦公开市场委员会“基于阈值”且与事实效果相反的前瞻性指导，他们将加息的概率与宣布失业率超过临界值的次数联系起来。研究结果显示，更准确地阐明加息条件需要更低的失业率阈值，以便提供可以度量的准确刺激。

本文原题为“The forward guidance paradox”。本文作者 **Silvia Merler** 是 **Bruegel** 研究员。原文于 2017 年 7 月 10 日发表在 **Bruegel** 官网。[单击此处可以访问原文链接。](#)

印度应积极投身于时代的动荡

Suman Bery/文 黄杨荔/编译

导读：面对中国日益成为国际准则的制定者，印度愈发感到不适。然而，这对印度而言几乎不可避免，因而需积极做好准备加以应对。编译如下：

大约六周以前，印度拒绝参加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北京举办的“一带一路”论坛。印度的怠慢之举并非独有，也充满争议，尽管这并不出人意料。从那时起，莫迪总理与高级官员就开始了一场繁忙的访问和外交活动，去接触不同的合作伙伴和对话者，其中包括非洲开发银行在甘地纳格尔的年会、在阿斯塔纳召开的上海合作组织会议，并对俄罗斯、西班牙、法国和德国开展了一轮国家访问，最近还访问了美国、葡萄牙和荷兰。

随着总理的介入，国防和安全问题成了主导。但作为一名经济学家，我相信，即使在这些不确定时期，印度也会从与全球经济的更深层接触中受益。只要印度愿意，其现在已有足够的影响力参与到新兴世界秩序的塑造中去。

我出席了在北京举办的“一带一路”论坛，当时印度发表了关于拒绝参加中国领导峰会的声明。“一带一路”的概念与经济事务部(MEA)的理解似乎存在很大差距：令人困惑的是，“一带”指通过中亚和欧洲连接太平洋和大西洋的东西向陆地贯连，“一路”指连接陆地的海上线路。

印度的直接关切似乎是一个特定的问题，即中-巴经济走廊及其上的多个要塞，尤其是巴基斯坦的瓜达尔港、斯里兰卡的汉班托塔和科伦坡港口。毫无疑问，在观念和取向上，“一带一路”是分散的、尚未定型的、以中国为中心的。然而，“一带一路”的组成部分已经为中亚地区大片资源丰富的地区提供了陆地连接，甚至与俄罗斯和土耳其的内陆地区一样广泛，以至普京总统和埃尔多安总统都选择加入。某种意义上印度存在着优越感，因为匈牙利等“一带一路”沿途的欧盟成员国很容易陷入债务陷阱，尽管欧盟确实担心“一带一路”项目与欧盟成员国现有融资、采购协议之间的一致性。

中国对“一带一路”目标的描述远不止地理上、数字上的连接，而这些额外的维度为印度的外交带来了更重要的挑战和机遇。正如习近平主席今年1月在达沃斯讲话中表述的那样，随着来自发达国家的支持逐步减弱，中国正将自身视为全球经济持续一体化的旗手。

虽然全球化 2.0 与现有全球治理机构之间的关系尚不明确，后者包括以条约为基础的组织（联合国、世界贸易组织、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世界银行和区域发展银行）和 G20 之类的非正式组织。这些机构缓慢的改革进展促使中国在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和金砖国家共同发起、总部位于上海的新开发银行中承担起领导角色。正如历届政府所阐明的那样，印度的外交政策一直寻求于创造一定的外部环境，以支持经济和社会转型。1991 年印度经历了历史性的、迟来的决定，开始与全球经济进行更为深入的整合，从那时起，上述外部环境就包括了开放的贸易和金融秩序，而这些规则通常由发达国家制定，主要取决于 G7 集团，印度的加入或许引发了一些怨言。

作为全球准则日益重要的制定者，中国的到来可能会让印度感到不安，但这几乎不可避免。这让我想起了印度最近几周的外交活动，尤其是最近几周对欧洲各国政府的关注。尽管这一时机可能很偶然，但在意大利举行的 G7 集团峰会上，美国总统和德国总理的关系明显紧张了许多。马克龙总统在全国议会选举中取得的非凡成功预示着，在欧元区经济形势逐步好转的情况下，法国将重返德-法在欧洲的领导地位。

这并非要否认印度、欧盟委员会和各国在广泛的经济社会问题上的显著差异，而是更希望从两方面敦促印度的政策制定者：第一是更积极地参与全球治理，因为对于印度来说，“搭便车”可能比过去更不舒服；第二则是欧洲外交中的一个关键词——多变的几何结构。通过一定的外交努力，印度已经与广泛的合作伙伴建立了友好关系，尤其是美国、日本、法国和德国。正如在上海合作组织峰会上展示的那样，尽管存在许多严重的分歧，但印度也与中国保持着工作关系。在与印度关系重大的问题上，发展联盟将是一件很有意义的事情。正如印度成立于 1991 年，当前全球动荡的时期或许也是一个机遇。

本文原题为“Engagement in a time of turbulence”。本文作者为 Suman Bery，壳牌公司首席经济学家。本文于 2017 年 7 月刊于 Bruegel 网站。[单击此处可以访问原文链接。](#)

本期智库介绍

The Center for Economic Policy Research (CEPR) 经济政策研究中心

简介：经济政策研究中心成立于1983年。它包括七百多位研究人员，分布于28个国家的237家机构中（主要是欧洲高校）。其特点是提供政策相关的学术研究、并关注欧洲。Voxeu.org是CEPR的门户网站，受众为政府部门的经济学家、国际组织等。它的文章多为与政策相关的工作论文初稿，比财经报纸专栏更为深入，同时比专业学术文章更加易懂。

网址：<http://www.voxeu.org/>

The Royal Institute of International Affairs Chatham House (Chatham House) 英国皇家国际事务研究所

简介：英国皇家国际事务研究所成立于1920年，位于伦敦圣詹姆斯广场著名的查塔姆大厦内。是目前英国规模最大、世界最著名的国际问题研究中心之一。其宗旨是“推动个人和组织对日益复杂多变的世界进行全面研究，并提供政策参考。”英国皇家国际事务研究所与英国政府、企业、媒体和学术界均有着广泛的联系，对政府的外交政策有一定的影响。在《2011年全球智库报告》（The Global Go To Think Tanks 2011）中，Chatham House 在全球（含美国）30大智库中列第2名，全球30大国内经济政策智库中列第6名，全球30大国际经济政策智库中列第4名。

网址：www.chathamhouse.org/

Brussels European and Global Economic Laboratory (bruegel) 布鲁塞尔欧洲与全球经济实验室

简介：布鲁塞尔欧洲与全球经济实验室成立于2005年，是主要研究国际经济的独立、非理论（non-doctrinal）的智库。致力于通过开放、基于事实并且与政策有关的研究、分析和讨论，对欧洲及全球经济政策制定作出贡献。bruegel的成员包括欧盟各国政府以及一些领先的国际公司。在《2011年全球智库报告》（The Global Go To Think Tanks 2011）中，bruegel 在全球（含美国）30大智库中列第16名，全球30大国内经济政策智库中列第9名，全球30大国际经济政策智库中列第3名。

网址：<http://www.bruegel.org/>

Council on Foreign Relations (CFR) 外交关系协会

简介：成立于1921年，是美国非政府性的研究机构，致力于对国际事务和美国外交政策的研究。CFR是一个由精英学者组成的组织，成立伊始就成为20世纪美国最有影响力的智囊机构，曾为威尔逊总统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出谋划策。该协会主办的《外交事务》杂志曾刊登过乔治·凯南、基辛格和斯坦利·霍夫曼等美国知名外交家、国际政治学者的论文。在《2011年全球智库报告》（The Global Go To Think Tanks 2011）中，CFR 在全球（含美国）30大智库中列第4名，全球30大国际经济政策智库第6名。

网址：<http://www.cfr.org/>

RAND Corporation (RAND) 兰德公司

简介：兰德公司成立于1948年，是美国最重要的以军事为主的综合性战略研究机构。在其成立之初主要为美国军方提供调研和情报分析服务。其后，RAND 逐步扩展，并为其它政府以及盈利性团体提供服务。在《2011年全球智库报告》（The Global

Go To Think Tanks 2011) 中, RAND 在全球(含美国) 30 大智库中列第 6 名, 全球 30 大国内经济政策智库中列第 8 名, 全球 30 大国际经济政策智库第 13 名。

网址: <http://www.rand.org/>

The Center for International Governance Innovation (CIGI) 国际治理创新中心

简介: CIGI 是关注全球治理的独立智库, 由 Jim Balsillie 成立于 2001 年。它的主要活动包括资助研究、创造交流网络、促进政策讨论、提高多边治理能力。具体而言, 它的研究集中于以下四个方面: 全球经济、环境与能源、全球发展、全球安全。它致力于将学术应用于政治, 通过优秀的研究与分析来影响政治决策。

网址: <http://www.cigionline.org/>

Peter G. Peterson Institute for International Economics (PIIE) 彼得森国际经济研究所

简介: 由伯格斯坦(C. Fred Bergsten) 成立于 1981 年, 是非牟利、无党派在美国智库。2006 年, 为了纪念其共同创始人彼得·乔治·彼得森(Peter G. Peterson), 更名为“彼得·乔治·彼得森国际经济研究所”。在《2011 年全球智库报告》(The Global Go To Think Tanks 2011) 中, PIIE 在全球(含美国) 30 大智库中列第 10 名, 全球 30 大国内经济政策智库中列第 4 名, 全球 30 大国际经济政策智库第 1 名。

网址: <http://www.iie.com/>

International Monetary Fund (IMF)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

简介: IMF 于 1945 年 12 月 27 日成立, 为世界两大金融机构之一, 职责是监察货币汇率和各国贸易情况、提供技术和资金协助, 确保全球金融制度运作正常, 其总部设在华盛顿。IMF 主要通过监督、贷款以及技术援助和培训三大职能来促成国际金融体系的稳定。IMF 的工作论文及其他出版物在全球宏观经济政策研究方面拥有巨大影响。

网址: <http://www.imf.org/>

Cato Institute 加图研究所

简介: 加图研究所位于华盛顿特区, 成立于 1977 年, 是美国最具影响力的大型智库之一。加图研究所以古典自由主义传统为思想根基, 致力于“扩展公共政策辩论维度”, 通过独立、超越党派的公共政策研究和讨论, 旨在“恢复小政府、个人自由、自由市场以及和平的美国传统”。加图研究所的政策分析曾经影响过里根政府和布什政府的政策。在《2011 年全球智库报告》(The Global Go To Think Tanks 2011) 中, 加图研究所在全球(含美国) 30 大智库中列第 14 名, 全球 30 大国内经济政策智库中列第 3 名, 全球 30 大国际经济政策智库第 8 名。

网址: <http://www.cato.org/>